

实在学不了那么多

吴非

前一阵,隔三差五接到诈骗电话,我可能还算有些判断力,往往不等他说完“猜猜我是谁”或是“法院传票”,就挂断。媒体走群众路线,常给广大观众普及识假防骗常识,也有必要。这些年,跟着电视识假防假,须识须防的计有:假币,假车票,假酒,有毒大米,死猪肉,注水肉,假羊肉,假奶粉,地沟油,假蜂蜜,非法添加剂,劣质中药材,假药,还有假医院,无资质美容机构,假记者……随着电信事业的飞速发展,各种诈骗术也跨入电子时代。

我来学个舌——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然而,那些专业知识和能力,一般人真的能通过速成获得么?比如,一位文化程度一般的老人,有没有可能通过几分钟的“普及”便能识别伪劣中药材?他究竟有没有可能,通过“闻一闻气味”,“观察色泽”,并随身带一份真药材作“作比较”?然而电视台就是这样教观众识别伪劣中药材的!药品与保健品市场为什么出乱象?这就不得不想到报纸电视台的推波助澜,电视台没完没了地在播营养品药品广告,而没有一家电视台是私人开办的。

电视讲座所教的识假辨劣的方法往往也很古怪。比如,两种保鲜膜,哪一种安全的呢?专家介绍,先比较颜色,颜色淡的是什么,颜色透明的是什么。然而五分钟不到,我就记不得了哪个是哪个了。专家又教一法:撕一块,烧;烧时变得焦黑的是什么,烧时发黏的是什么。我立刻纳闷:现在的商场允许顾客在店堂里扯去包装试验,“先烧后买”吗?小心“调取监控视频”,告你一个纵火,吃得消么?

大致小结了一下近年媒体教授的防骗术,不禁感伤:我不太聪明,实在学不了那么多东西;况且本来我以为,到了一定的年纪,是可以逐渐“放松学习”的;又况且,要学的防骗术太多太多,每天学,不敢放松,一个人睁着老眼到处设防,对群众,对社会,还能有信任么?

人的接受能力是有限的,人的精力也是有限的,从小到老,要学那么多本不必学的东西,要防那么多多人,是谁造成的?那些鉴别技术,不是我的专业;识假打假,也不是我的职责。而现在一样一样,全拿来教我,把职能部门该管该做的事,下放到一个具体的“群众”这里来,动辄要我去“警惕”,合适吗?

有时间这样折腾我们,为什么不去查去禁,去封门?很多事,有主管单位,有专业执法部门;该他们管的,竟然要民众来负责,那凭什么要养着“有关部门”呢?比如,不是没有产品质量标准,可是不查不办,把公务变为群众的私责,让人们自行辨别防范,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有法不依,“有法不执”,该管的不管,把责任转嫁给民众,是社会落后的表现。

我想,让民众过得省心,节约他们的智慧,珍视他们的信任,就是维护人的生命尊严,至于富裕与否,可能倒在其次。



大致小结了一下近年媒体教授的防骗术,不禁感伤:我不太聪明,实在学不了那么多东西;况且本来我以为,到了一定的年纪,是可以逐渐“放松学习”的;又况且,要学的防骗术太多太多,每天学,不敢放松,一个人睁着老眼到处设防,对群众,对社会,还能有信任么?

人的接受能力是有限的,人的精力也是有限的,从小到老,要学那么多本不必学的东西,要防那么多多人,是谁造成的?那些鉴别技术,不是我的专业;识假打假,也不是我的职责。而现在一样一样,全拿来教我,把职能部门该管该做的事,下放到一个具体的“群众”这里来,动辄要我去“警惕”,合适吗?

有时间这样折腾我们,为什么不去查去禁,去封门?很多事,有主管单位,有专业执法部门;该他们管的,竟然要民众来负责,那凭什么要养着“有关部门”呢?比如,不是没有产品质量标准,可是不查不办,把公务变为群众的私责,让人们自行辨别防范,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有法不依,“有法不执”,该管的不管,把责任转嫁给民众,是社会落后的表现。

我想,让民众过得省心,节约他们的智慧,珍视他们的信任,就是维护人的生命尊严,至于富裕与否,可能倒在其次。

孙小琪是我的学长,她在 1978 年夏天毕业后留校,当了 78 级新生的辅导员(我们那个时候好像是叫指导员)。孙小琪在我的印象里非常活跃,喜欢文艺创作。自从卢新华在班级墙报上贴出了短篇小说《伤痕》以后,同学之间,老师之间,引起了不断的争论。好像是孙小琪把这篇争议小说送到《文汇报》编辑部,后来《文汇报》发表《伤痕》,产生了社会的轰动效应。其推荐之功不能抹杀。

那时候孙小琪自己也



气枪,做起了“资本主义尾巴”——打麻雀补贴家用。

这活得看天的脸色行事。吃了晚饭,如果天气晴朗无风又无月亮,便背起十多斤重的电瓶,腰系电筒、鱼篓,背着枪带上“小高升”,坐上朋友自己装配的摩托车结伴出发。到了目的地,用手电筒在树上寻找目标。看到那白花花的棉球般的麻雀肚子,便就着灯光举枪。有时能打二三百只,每每三只,可说是满载而归了;有时到了目的地,明月当空,如同白昼,人还没到树下,麻雀已被惊飞。遇到这种天气,一夜收获三四十只已很不错了;有时出门天气好好的,到了目的地却狂风暴雨,举枪瞄不准目标,无功而返不说,自己倒成了落汤鸡。

那段日子“小高升”不是解馋而是解乏,心头一番别样的滋味。

打完麻雀,还必须在清晨五点以前赶到家,把打烂的麻雀剔出来后,让老婆赶早到菜场去卖。我则抓紧睡一会,因为八点前还必须赶到单位上班。那几年我打麻雀的痕迹除松江之外,还留在了青浦、奉贤、金山等地。那几年,那酒喝得太苦涩,太酸楚,太无奈,有时举杯自问:这叫福水?!

弹指一挥间,原先伴随我的“小高升”早已不见了踪影,现在喝的则是上海老酒、优质干红,柜子里还站满了茅台、五粮液。无论是朋友间的欢聚或在家中自斟自饮,端起酒杯,扑鼻的醇香惹得人未饮先醉,当“吱”的一声喝到嘴里,微闭双眼舍不得咽下,细细品析,久久回味,常常会情不自禁地连喊:好酒!好酒!酒喝到这份上,才是福水!

不曾出了轨道

陈思和

热衷创作,在本书中她还收入了两篇 1978 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一篇叫《憨叔》,一篇叫《纺车喻喻》,不属于那种长歌当哭的伤痕文学,而是比较温馨的知青文学。小说里的主人公女知青多少有小琪本人的影子。铁姑娘似的劳动模范,热情向上的积极分子,还担任了当地的生产队长,等等,他们是怀着时代投射在他们身上的虚幻



刚踏进电视台那会儿,使用的摄像机还是 DVRPRO 机器,塞进带子,那带子使用时间长了,还容易掉磁迹、卡带子,每天外采结束,要到编辑机房磨蹭上半小时,然后等着把播出带串起来,最后守在电视机前看新闻播出。有一次因为从奉贤回市区路途遥远,赶回台已经傍晚 5 点多,为了提高新闻时效,憋着一股子劲,竟然在直播前 20 分钟完成了一条 5 分钟的新闻,最后在播出前 5 分钟把带子送上了直播台,想想就怕,惊出一身冷汗!之后,BETCAM 机器、蓝光摄像机、非线性编辑数字播出、3G 直播……电视采访拍摄技术日新月异,不变的是对新闻的热情。只是,新闻传播技术在更新换代,新闻传播理念也在发展。信息爆炸、自媒体泛滥、移动互联网迅猛发展,我们思量着如何在重大新闻事件发生时,总能做到第一时间“在现场”,无论是汶川地震、11.15 大火、黄岩岛、利比亚战场……我和同事总想着如何无限接近事实本相,接近那些核心现场,在众声喧哗中表达自己的声音和观点,传播技术的发展,要求记者不仅仅要做到“人无我有”,而是努力做到“人有我优”。

的理想来到淮北农村,真的以为通过流血流汗、牺牲青春能够改变农村落后贫困的面貌。他们在与当地农民的实际交往中,既感受农民的朴素和温情,同情农民的赤贫生活,也看不惯农民头脑里的被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认为是落后自私的小农意识。故事的基调延续了启蒙的含义,但对于作为改造者的知青立场也多少有些反省,更主要的是,她直接通过人物表述了一个事实:中国的农民不满意也不喜欢贫困落后的农村生活,他们向往往上相对自由和富裕的生活,农民的心底里同样燃烧着欲望的热情,这种热情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所鼓吹的人生观道德观完全反其道而行之。

孙小琪与她笔下的女主人公“我”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在 1949 年以后建立的新政权的意识形态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骨子里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自信以及敢于实践的真诚,我也属于这样一代人。所以我自信还是能够理解小琪的内心世界。她之所以要在过了耳顺之年编辑的自己文集里收入早期的两篇小说,自有她两篇所牵情所系的道理。这两篇小说的结尾中,主人公面对时代将发生大变动的前夕,内心都产生了反省、彷徨以及惶惑,而所有这一切心情的产生,又是与她在前提下对人生理想的坚持密切相关。我觉得这是很真实的内心写照。虽然后来的人生道路很长很复杂,也有很多变化,但是这种熔铸了一代人中间某些共性的性格特点,是这样一代人的人生起点。

具体的例子就是《岁月与人生》。这篇文章是为了纪念英年早逝的朋友俞自由——一个插队知青中的佼佼者,靠非凡的能力和自我奋斗,努力在各个

购买食物时,无论是饮料或罐头,总会特别留意,保鲜期到什么时候?过期食品,吃下去的结果,也许泻肚子,也许呕吐,也许胃胀,可能得看医生服药,还有可能得住院打点滴。

保鲜期 (马来西亚) 朵拉

后来才发现,原来,人和人相处也不例外。有效期到了,无论当时付出的价格有多高昂,也得不丢弃。

我的青春,我的年少,我的真心,我的情意,我的最美丽时光,那永远回不来的过去,全然是无比的珍贵,然而,不管有多么无奈,不舍弃,不放掉,吃苦的却是自己。

想想食物,过了保鲜期,不能用,不能吃,留下来也无私,只是在做垃圾的堆积。

人之间的感情和缘分,同样也是如此。

保鲜期有限了,虽非食物或罐头,也要冷静地小心处理,尽最大可能,纵然分手,也要带着微笑,纵然流泪,滴在心头就好,免得更重地受伤,吃药住院的下场,最不理想。

领域都尽量做到了最优秀。我不认识俞自由,但很早就听俞自由说起过,好像俞自由当年也是《伤痕》的支持者。她插队时努力奋斗,当上了安徽天长县的地方长官;后来放弃一切随丈夫出国深造,凭着惊人毅力又成为农业经济学的留美博士,竟聘到香港岭南大学当上了教授。风风火火的一生走得极为精彩,家庭,事业,人生都圆满,却偏是天不假年。孙小琪与俞自由是好朋友,人生道路也走得相仿佛,偏偏在俞自由患病的时候,她也染病在身,她们相聚在一起,是笼罩在怎样的心情之下呢?下面有一段文字,读起来不能不动心弦——

“去年一月,我病了。六月,她病了。她原本是回上海过端午的,她的教案还摊在香港家里的桌上。8 月 8 日,蒙城的县委书记和县长来上海看我们……那天,俞自由激情洋溢,她说我们可以组织讲师团,给盐城老师培训,孙小琪讲语文,我讲数学,讲经济,我们一定受欢迎的。当时,我下意识摸了摸自己头上的帽子,我的因化疗脱落的头发还没长出来。而俞自由,我看了看她坐在椅子上还撑着拐杖的手。赵国屏在边上说:精神支柱,精神支柱。”

这样的文字,不知道别人读了感觉如何,我确实是感到心被掀起。倒也不是为了两个我所熟识和不熟识的女性命运而难过,却是从两个相似的人生道路上相遇的生命之间的呼应而被唤起冥冥中的命运感。在俞自由的追悼会上,香港岭南大学的同事在悼词里提到了纪伯伦的话:“从工作里爱了生命,就是通彻生命最深的秘密。”这句话也是久违了的,“从工作里爱了生命”是什么意思?“工作”又意味着什么?如何理解“生命最深的秘密”?这是一系列值得思考或者感悟的关键词。应该补充的是,这里纪伯伦说的生命当然是人的生命,一个受过文明熏陶后的人的生命。这就把人的高贵性质与一般的生命价值区分开来了。

(本文为《不曾出了轨道》序)

奇,都让我感受到存在的价值。每个记者都希望记录国家大事,甚至是国际大事,那也意味着你要胜过成千上万的记者,要比任何一个敢于赴死的记者更加无所畏惧;而更多的,是每天在我们城市发生的感人事、紧要事、贴心事给我的人生感悟,让我唏嘘让我成熟。所以,在地震现场,我们的采访车用来捎带那些扛着棉被的村民;我们也可以把口粮留给更需要帮助的灾区人民。记得有一次,一对年轻夫妇因为感情纠纷双双身亡,留下一个 2 岁的男童,我与孩子的爷爷奶奶取得联系,帮他们联系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的医生,给孩子免费做手术以解其后顾之忧,当老人眼含热泪表示感谢,我只希望他们能坚强面对灾难。目睹普通人的悲欢离合、感悟平凡人的不平凡事迹——尤其是那些通过媒体报道后给予新闻当事人留下的切切实实的变化,以及每个当事人因为我的采访而留下的新闻缘分,给我很大的满足感和成就感。

新闻的力量是成长、拼搏和信念,请看明日本栏。



新闻的力量